



《論衡》與 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

● 胡敕瑞 著 ●



巴蜀書社



● 胡敕瑞 著

《論衡》與
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

巴蜀書社 中國 成都

胡敕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胡敕瑞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2. 11

ISBN 7-80659-343-8

I. 論... II. 胡... III. 漢語—詞語—對比研究—古代
IV. 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62195 號

策劃組稿:汪啓明

責任編輯:譚曉紅

封面設計:李文金

《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 胡敕瑞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125

字數 27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ISBN 7-80659-343-8/H·35

定價:24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內容提要

本書以東漢詞彙為選題，以《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的比較為研究對象。

通過對《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的比較，旨在揭明兩種材料詞彙上的異同。其相同的部分，可以呈現東漢斷代詞彙的部分面貌；其不同的部分，可以反映兩種材料詞彙上存在的具體差異，而這種共時的差異往往又可以折射出某些歷時的變化。

圍繞比較兩種材料詞彙異同這一核心，本書在進行共時比較的同時也結合歷時的比較；在定性分析的同時，也注重定量的統計說明；在大量描寫異同事實的基礎上，也對一些變化的事實試圖作出解釋。

詞彙比較的內容主要是詞形、詞義、詞語關係、結構用法等諸多方面，所以本文分列五章分別從單、複音詞，新、舊詞，新義，同義、反義詞，結構和搭配等五個方面對《論衡》與佛典詞語進行比較。

比較的結果是，佛典詞彙比《論衡》詞彙更趨新，佛典詞彙與中古詞彙有更多的相同之處，中古不少詞彙的源頭就在佛典，

而《論衡》詞彙還保留了很多上古詞彙的舊面貌；《論衡》和佛典詞彙也有一些相同的成分，其中有些詞語具有東漢口語詞彙的特徵，通過兩種材料的比較可以得到互證，不過《論衡》口語還遠遠不及佛典；佛典本身也存在前期譯經和後期譯經的差異，前期譯經口語性強，後期譯經則有不少文言詞彙。

關鍵詞：東漢 詞彙 論衡 佛典 比較 異同



Abstract

This book is on the study of the vocabulary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and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Lunheng and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 Han Dynasty.

By comparing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Lunheng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we try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ords used in the two kinds of language materials. From the similarities, we can partly see the panorama of the vocabulary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and from the differences, we can see the delicate shades of meaning and usage of word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language materials. In fact the synchronic differences also mirror the diachronic changes in the vocabulary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While comparing the two kinds of language materials, we seek to investigate the diachronic changes as well as the synchronic changes,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try to expound some changed facts after enumerat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the two materials.

In this book, our study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forms, meanings, relation and structure of words and their usages. Therefore, the five chapters of this book deal with vocabulary in Lunheng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aspects such as monosyllabic, di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words, new and old

coinages, new meanings, synonyms and antonyms, and structure and colloca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facts mentioned above, this book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re newer than those used in Lunheng and, they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vocabulary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In fact, the sources of man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Contrary to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Lunheng retain many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times. However, some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in Lunheng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sh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for example, some words retain the features of the colloquialism in East Han dynasty, hence the two materials can corroborate each other. Nonetheless, vocabularies use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re far more colloquial than that of Lunheng.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having more elements of colloquialism and the latter having many ancient words.

Keywords: East – Han Dynasty, Vocabulary, Comparative Linguistic Study, Lunheng, Buddhist Scriptures

序

在漢語史的研究中，詞彙研究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在語音、語法、詞彙三者之中，詞彙的發展變化是最迅速的。於一個時期的文獻，後代人看不懂了，主要是由於詞彙的變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有一些學者對那些難懂的詞語作解釋，這就是古代的訓詁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訓詁學比音韻學、語法學都要早得多。但是時至今日，在漢語史的研究中，詞彙的研究却比不上音韻、語法的研究。其原因，我想有兩個：一是詞彙比語音、語法要複雜得多。在漢語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基本的詞語意義發生了相當複雜的變化，同時，各個時期都產生一批新詞語，其數量相當可觀。如果我們要編一本像《牛津英語詞典》那樣的《漢語歷史大詞典》，其規模不知道要比《牛津英語詞典》大多少倍！而要編寫這樣一部詞典，就要把漢語史上這些詞語的意義及其發展一一弄清楚。這一方面的工作，近50年來有了很大的進展，但要編出一本完備的、高水平的《漢語歷史大詞典》，還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二是詞彙系統沒有語音系統、語法系統那樣嚴密。研究漢語歷史詞彙，是要把詞彙作為一個系

統來研究的。弄清漢語歷史上各個詞語的意義固然非常重要，但這還不是漢語歷史詞彙研究的終極目標，我們還必須在大致弄清各個時期漢語詞彙的面貌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漢語詞彙發展演變的規律，研究漢語詞彙系統的歷史變化。而在這一方面，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進展還不很大，我們對漢語詞彙發展演變的規律、對漢語詞彙系統的歷史變化還知之甚少。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對這項工作重視不夠，另一方面，也和詞彙系統本身的特點有關：對詞彙作系統的研究，比語音、語法要難。張志公先生曾經說過：“詞彙重要，詞彙難。”這話言簡意賅，把我上面所說的兩層意思都概括了。既然重要，就不應該知難而退，應該知難而進。特別是青年學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銳，更應該是這一攻堅戰的主力軍。近年來，漢語歷史詞彙研究的著作雖然數量不算太多，但不斷有一些高質量的論著出來，這是令人高興的。現在，胡敕瑞的《〈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由巴蜀書社出版，又給我們提供了一本好書，我願意借此機會向讀者推薦。

這本書在漢語歷史詞彙研究方面選擇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選擇了兩種重要的文獻資料加以比較。接觸過較多歷史文獻的人都會感到，東漢時期有一些文獻的語言比起先秦和西漢來，有一些變化。但這祇是一種感覺。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主張把東漢到隋劃為漢語史上一個獨立的階段，稱之為“中古漢語”。但東漢的語言和先秦、西漢究竟有什麼不同，也還有待於具體的分析和論證。《〈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一書從《論衡》和東漢佛典中找出了不少新詞新義和新的同義詞、反義詞組合，充分說明了東漢時期的詞彙有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東漢佛典的詞彙和先秦、西漢有較大的不同。書中對《論衡》和東漢佛典的

詞彙作了細致的比較，用具體的材料說明，在新詞新義的使用方面，佛典比以《論衡》為代表的中土文獻要快。近年來，早期漢譯佛典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價值逐漸被人們認識，但漢譯佛典和同時期的中土文獻的比較研究還做得不多。此書在兩者的比較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工夫，首先，對已有的關於《論衡》的校勘、訓釋的成果作了全面的整理，對經過考訂時代無疑的29種東漢譯經作了細致的梳理；然後，在此基礎上，從詞形、詞義、同義反義關係、詞語結構、詞語用法等幾個方面對兩者的詞語進行比較，把兩種材料的異同清楚地描寫出來。比如，書中告訴我們：東漢佛典中的新詞語比《論衡》多：《論衡》中新興的單音詞有34個，複音詞有619個，東漢佛典中新興的單音詞有61個，複音詞有1039個。東漢佛典中的新義也比《論衡》多，一個詞出現多個新義和雙音詞出現新義的情況，也是東漢佛典比《論衡》多。當然就個別詞語而言，書中所列舉的有些新詞新義還可以討論，因而統計數字也會有些小出入，但就總體而言，這些經過認真研究得到的資料和結論是可信的，也是很有價值的。漢語歷史詞彙的研究就應該這樣扎扎實實地從基礎工作做起，把一些重要的文獻的詞彙面貌，或一個時期的詞彙面貌弄清楚，一點一點的積累起來，就可以顯示出漢語詞彙歷史發展的輪廓。

《〈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對詞語變化的機制和方式以及詞義發展的途徑作了探討。書中認為詞語變化的機制有填補空格、類推創新、拉鏈推鏈等。詞義發展的途徑有引申、相因生義、格式同化、感染、反流等。不難看出，作者不滿足於對詞彙和詞義的發展演變作細致的描寫，而是力圖在描寫的基礎上對詞彙和詞義的發展演變作理論上的思考，力圖尋

找出詞彙和詞義的發展演變的規律。這種努力無疑是應當肯定的。我們的漢語語言學研究有個優良傳統：求實。求實不僅僅是指尋求對漢語事實的忠實描寫，而且是指在正確描寫的基礎上探求漢語的客觀規律。對語言規律的探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對大量的事實作深入的觀察和高度的概括，而不同研究者的觀察和概括很可能有角度的不同和認識的不同，所以，觀察和概括得出的結論，也許開始時未必能成為共識。比如，古代的“走”後來為“跑”代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詞語替換的機制是什麼？是“拉鏈”還是“推鏈”？還有沒有其他的解釋和概括？這就會有不同意見。我想，這是很正常的，特別是在我們的研究處於初始階段的時候，更是如此。對漢語詞彙和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的探求也是一個集體工程，也是需要經過衆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來逐步推進的。在這方面，也需要有知難而進的精神。祇有加強理論思考，加強對詞彙和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的探求，才能使我們的漢語歷史詞彙的研究登上一個新的臺階。

《〈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這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那篇博士論文曾獲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獎，說明他在攻讀博士的階段已經具備了較高的研究能力。獲得博士學位以後，胡敕瑞又進入奧斯陸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在著名漢學家、挪威科學院院士何莫邪的指導下進修一年，在學術方面更加開闊了眼界。這兩個階段的學習和收獲，為他今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胡敕瑞還有一個優點：做學問認真刻苦。良好的基礎和優良的學風是成功的保證，希望他繼續努力，在漢語史的研究中做出更大的成績。

蔣紹愚

2002年8月于北大

緒 論

漢語有文獻可考的歷史有三千多年，漢語史的研究就是探討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彙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一、漢語詞彙研究的現狀

作為和漢語語音、語法鼎足而三的漢語詞彙研究開展得最早，肇始於先秦的傳統語文學一直致力於詞彙的訓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詞彙資料。但是，傳統語文學研究範圍主要囿於漢代以前的經典，研究方法過分依賴歸納排比，研究對象多集中在一些生僻詞語上，這些不能不說是它的局限。當然，我們不能過多地苛求前人，因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學問。

上個世紀以來，由於研究者對漢語自身的深入思考，以及受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人們對漢語詞彙研究的認識有了改變。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王力先生就提出了對“舊訓詁學的總清算”，認為“舊訓詁學的弊病，最大的一點乃是崇古。小學本是經學的附庸，最初的目的是在乎明經，後來範圍較大，也不過限於‘明

古’，先秦的字義，差不多成為小學家唯一的對象”^①。為此，他明確提出了“新訓詁學”。幾十年過去了，經過學者的不懈努力，漢語詞彙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體表現在研究的範圍有所擴大，研究的對象有所拓展，研究的問題更為深入，研究的方法越來越多。但是相對於語音、語法的研究來說，漢語詞彙的研究依然落在後頭，真正意義上的詞彙學還在蹣跚不前。

二、選題的緣由和研究的材料

一方面，漢語詞彙研究的嚴重滯後，對於漢語史的整體研究是不相稱的，因為詞彙和語音、語法是密切相關的，詞彙研究的落後勢必影響語音、語法的研究。另一方面，縱觀漢語詞彙的研究，所研究的各個階段又是不均衡的。按照漢語史的分期，東漢以前是上古，魏晉至唐初是中古，唐初至清初是近代^②。一般的看法是，詞彙研究詳於上古而略於近代，呈虎頭蛇尾之勢^③。實際上，上古詞彙的研究也并非完備至善，東漢的研究就更顯薄弱，然而東漢乃處於上承上古、下啓中古的關鍵時期，研究者普遍有一種感覺，即中古時期的詞彙有不少與上古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們不對東漢這一過渡時期予以足夠的重視，就很難看清中古巨變的來源。有鑒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們的研究要以

① 參看王力先生《新訓詁學》，原載《開明書店二十周年論文集》，又載《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一冊）第316頁，中華書局，1980。

② 這種分期綜合了幾家的看法，“上古”“中古”的劃分基本上是依照太田辰夫的看法，稍有區別的是我們不把東漢算入“上古”，而是當作上古到中古的一個過渡期；“近代”是採用蔣紹愚先生的看法。

③ 參看蔣冀騁先生《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第1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詞彙爲選題，而且特地選擇東漢一期。

東漢近二百年的歷史，期間文獻浩博，憑個人的力量一時不可能對其詞彙系統進行全面的斷代描寫。“在我們還無法描寫一個時期的詞彙系統的時候，祇能從局部做起，即除了對單個的詞語考釋之外，還要把某一階段的某些相關的詞語（包括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作綜合的或比較的研究”^①。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所以我們選取《論衡》和東漢佛典（以下簡稱佛典）兩種材料的詞語來作比較。

在東漢時期獨獨選取這兩種材料，是因爲它們具有同期其他語料不可比擬的典型價值，其典型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兩種材料真實可靠，作者及作品篇目大致可考。《論衡》的作者王充係會稽上虞人，生於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和帝永元中（約公元 97 年）病卒於家；佛典的譯者主要是外來僧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安世高、安玄來自安息，安世高（又名安清）本爲安息國太子，由於宗仰佛教，他放棄王位，展轉來到中國，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定居洛陽，安玄是一位優婆塞，大約在光和四年（公元 181 年）以商人的身份來到洛陽；支婁迦讖（又稱支讖）、支曜來自月氏，支讖在桓帝末年（約公元 167 年）來到洛陽，支曜在靈、獻二帝間來到洛陽，比支讖稍後；康孟詳是康居人，也在靈、獻二帝間來到洛陽；竺大力、曇果是印度人，大約在獻帝時期來到洛陽。除外來譯人之外，漢地僧人嚴佛調等人也參與了佛典的翻譯。東漢譯經的數目，歷代經

① 參看蔣紹愚先生《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 287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錄的著錄多寡不一，《大正藏》收錄的東漢譯經多達 96 種，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懷疑的，經過呂澂、許理和（荷蘭）等中外學人的共同考訂^①，其中有 29 種被公認為東漢作品。按譯者的不同，及時間的先後可分六組^②：

1. 安世高譯（譯經時期 約公元 150—170 年）16 種；
2. 支婁迦讖譯（譯經時期 約公元 170—190 年）8 種；
3. 安玄共嚴佛調合譯（譯經時期 約公元 181 年）1 種；
4. 支曜譯（譯經時期 約 2 世紀末）1 種；
5. 康孟詳、曇果等合譯（譯經時期 約公元 200 年）2 種；
6. 譯者不明但確屬東漢的 1 種。

由於兩種材料的作者和譯者大都有名有姓，成書年代及其篇目又大致可考，所以可以保證比較是建立在材料可信的基礎上。

其次，兩種材料內容豐富。《論衡》一書包羅萬象，“上至黃唐，下臻秦漢而來”，“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該詳”^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劉盼遂據《論衡·自紀》以為《論衡》當在百篇以外，而歷來著錄的都是 85 篇，其中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無書，實存 84 篇，全書約 22 萬多字，不失為一份豐富的語料。佛典 29 種，約 38 萬字。其中安世高譯經約 10 萬字，內容主要是“定”（禪法）、“慧”（數法）兩方面的學說，屬於經藏中的小乘；支讖的譯經數量最多，約 18 萬字，基本上屬於經藏中的大乘；

① 參看呂澂先生《中國佛學源流略講》、《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許理和（荷蘭）《佛教征服中國》、《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蔣紹愚譯，載《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及其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 等相關論述。

② 各組的具體篇目詳見書後所附的引用資料。

③ 語出《論衡·自紀》。

其他人的譯經 10 萬字左右，內容也主要是大乘。由於兩種材料數量頗豐，所以有利於從中考察它們在用語上的異同。

再次，兩種材料用語淺易，口語成分較多。《論衡》一書因其淺露易曉，向來被譏為“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①，語雖含貶意，但從“談助”的評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論衡》用語通俗的一面。不尚華文，語貴淺近，是《論衡》作者有意追求的，因為他痛恨“虛妄之言勝真美”，所以主張“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言無不可曉，旨無不可睹”，並明確表明自己作書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佛典最早由民間傳入，其主要的宣傳對象也是普通大眾；最初的譯者又都是外來僧人，他們通曉的是當時的漢語口語，並不具備深厚的文言功底；且譯經之事又屬首創，沒有文言的範例可供參考。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佛典具有很强的口語性質。特別是早期安世高、支讖的譯經謹守“敬順聖言，了不加飾”的翻譯方針，用語祇求質直，不求文飾。由於《論衡》和佛典用語都很通俗，所以它們對於詞彙的研究具有特別的價值。

此外，《論衡》是中土文獻，佛典是外來譯經；《論衡》主要是儒家思想（旁及諸子），佛典主要是佛教教義；《論衡》多用對句，早期安世高、支讖的譯經基本上採取散句^②；《論衡》的作者是土生土長的漢人，漢語修養好，佛典的譯者大都是外來的僧人，漢語水平不一。由於兩種材料存在以上諸多差異，反映在詞彙上的差異也就可能越多，因而也就越有可比性。

① 參看《論衡校釋》附編三《論衡舊評》。

② 從支曜的譯經開始，四字整句纔漸漸增多，康孟詳等人的譯經幾乎通篇都採用四字句，語體倒是與《論衡》更相近。

三、選題的意義和研究的方法

蔣禮鴻先生曾經指出，“研究古代語言，我以為應該從縱橫兩方面做起，所謂橫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所謂縱的方面，就是聯繫起各個時代的語言來看它們的繼承、發展和異同”^①。從縱的方面研究不同時代的語言自然離不開比較，從橫的方面研究一個時代的語言也離不開比較。《論衡》比佛典最早的譯經早半個多世紀，相隔並不很久，可以看作是共時的材料，拿兩種共時材料的詞彙來作系統的比較，這種研究以前還很少有人做過，我們的比較祇是一種嘗試。但是我們看到，漢語語音、語法的比較研究早就已經開展，上古、中古、近代音系的建立無不根植於對比之上，最早的語法專著《馬氏文通》更是中西語法比較的一個範例。呂叔湘先生曾提出語法的研究可以文言與文言比、白話與白話比、文言與白話比、漢語與英語比，並說“要明白一種語文的文法，祇有應用比較的方法”^②。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要建立漢語詞彙史也離不開比較的方法，因為祇有比較纔能發現異同，有了異同纔能認清各個時代詞彙系統的特點，有了各個時代詞彙系統的特點纔能建立整個漢語詞彙史。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很難把某個時代詞彙系統的特點說清楚，這與詞彙的比較研究開展得不够不無關係。

比較《論衡》與佛典詞彙，不但有可能辨清兩種材料詞彙的

① 參看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② 參看呂叔湘先生《中國文法要略》上卷初版例言，商務印書館，1982。